

语言学论文集

Essays in
Linguistics

3

广州外国语学校
语言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编

《语言学论文集》第三辑

广州外国语学院语言所

一九九五年二月

小序

黄建华

我院语言研究所编辑《语言学论文集》第三集，即将问世了。主编约我写几行字，作为集子的序言。说实在的，我并没有什么高论要发表，那就随便谈点感想吧。

近年来，不少中外学者，尤其是语言学家，都反复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桂诗春教授早几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伍铁平教授去年还以此为题出了专书^①。谢栋元教授最近也认为，“语言学：当代人文科学的骄子”^②。欧美学者这方面的言论尤为突出，这里不妨从伍教授的著作中转引几句：“语言学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属社会科学，它一直是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典范。”（葛林伯格）“在整部科学史中也许没有一章比语言学这门科学的出现更令人神往。”（卡西勒尔）“很可能，唯有语言学才称得上是科学，因为它成功地制订了实证的方法，认识了它所研究的现象的特性。”（列维——斯特罗斯）。^③……这样说来，语言学在当今的众多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中，占有一席崇高的地位，应无异议。

然而令我纳闷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且不说科研立项、拨款、评奖等决策运作方面许多时候都不如其它学科，就从纯学术角度而言吧，也常常显得矮其它学科一截。我随手翻阅了案头的两本大型工具书：一是国

内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另一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的《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前者按哲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图书馆学等学科，一共收录了近5000名学者，却没有语言学者的单独地位。后者分十二册编纂，这十二册分别是：“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学”、“法律学”、“行政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竟见不到语言学列入哪一册或放在何等位置上（至于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则归在“人文学”的范畴而不列入“社会科学”之列）。仅此两例，可见一斑。我敢断言：语言学的“领先”或“骄子”的地位，起码至目前为止，并未为大多数人所认同。

我是搞词典学的，多少也和语言学沾一点边，面对语言学尚不大为人了解的现状，本来很可以趁写此小序的机会，应和一下前面几位学者的意见，也来个大声疾呼，力陈当代语言学与信息智能学科相通，因而它是当今世界最有生命力的学科之一，如此等等。可是我正欲走笔疾书之际，却又犹豫了起来。

我记起有一位著名学者曾大致说过这样的话：许多专家都犯有一个毛病，认为他自己所从事的那一行最重要，其余皆不足道；其实他那一门，虽非不重要，但并没有重要到他所说的那种程度；他多半是钻在牛角尖里而不自觉。我不是什么专家，但却接近语言学这一门，如果我一个劲地为它叫好，岂不是有“王婆卖瓜”之嫌？看来我还是不置一词的好。

我认为，作为学术工作者，既要十分重视和专于自己所

钻研的那一门，又要懂得尊重他人所从事的领域，要有兼容百川的气概，自己虽不被理解而不悔，而最要紧的是不断贡献出有份量的成果来。因此，我向那些为语言学默默耕耘而又颇有收获的人表示由衷的敬意。他们的成果愈丰厚，应用效果愈显著，就愈会被他人所认识。虽然“桃李不言”，但已回应了为语言学正名定性的专家们的呼吁。可以预期，语言学这门学科在我国是一定能占据自己所应得的一席之地的。

本集子所收的都是我院教师写的文章。有人以为，同仁刊物，稿件来者不拒，质量无甚可观。这不过是想当然的看法。请花些时间读一下这第三集吧，你准会发现，它比前面两集又有了新的进步。我可以肯定地说，集子内的一些文章就是放在共开出版的一流刊物上也毫无不及之处的。广州外语学院内的一些“花朵”早已在墙外香了起来，但愿这墙内的香花照样有人欣赏。而且更希望：今后有更多的鲜花不断盛放！

1995年1月2日

注：

- ①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 ② 见《现代外语》1995年第1期。
- ③ 以上各句分别见该著的第94，39，137，138等页。

目 录

小序.....	黄建华 (1)
从“这个地方很郊区”谈起	
——略论言语中的语用策略.....	桂诗春 (1)
什么是语际语用学?	何自然 (12)
论语系和语言联盟的区分.....	王 钢 (33)
美学语言学的三个问题.....	钱冠连 (51)
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对比研究法.....	宁春岩 (68)
翻译句法学的一个理论框架.....	冯之林 (82)
语码转换中的结构分析.....	黄国文 (95)
现代汉语话语中的汉英语码转换.....	赵一农 (116)
西班牙语在美洲.....	马联昌, 顾惠莉 (128)
法国地方语言探究.....	蔡小红 (141)
琉球语浅探.....	邓婉芬 (157)
假借刍议.....	汪 坦 (165)
英语的Wh-疑问副句和Wh-关系副句.....	温宾利 (178)

词典学与词典评介专栏

语法与词典类型..... (俄) B.ak著, 陈楚祥节译	(189)
浅谈学生汉英词典的编写.....	源可乐 (200)
《LE ROBERT FOUR TOUS》小议	黄建华 (209)
《Hachette, le Dictionnaire de Notre	
Temps (1993)》简评	徐真华 (216)
俄语的界外词词典评介.....	李福安 (225)

从“这个地方很郊区”谈起

——略论言语中的语用策略

桂诗春

我曾经在广州和上海两地听到两位互不相识的教授在汉语口语中使用过“很郊区”的说法，而听众泰然处之，没有觉得很特别，回想起过去到山区访问老农，也常听到他们说，“您为什么跑到我们这儿来啦？这里很山！”我还以为这是广东老农的说法，后来听到我们学校的一位同志也说“我们那里很山，”就连忙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来自湘西。于是我开始注意这种用法，时有发现。例如台湾演员凌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说，“我的样子很中国！”电视导演邓在军在正大综艺节目里说，“我这个人很大的马大哈。”香港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员说，“点解甘唔环保啊？”“唔怕个的好暴力？”至于“比阿Q（某典型人物）还阿Q”的用法，更常会听到。去年应西北师范大学邀请沿丝绸之路访问敦煌，同行者有北京语言学院老前辈王还教授，她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多年，而且还是个老北京，我当即向她请教，上述说法能否成立，她断然说，这在汉语是不行的：“胡说八道！”第二天我们在途中谈起杨周翰教授，她满怀深情地追忆杨教授的语言天才，说杨教授是苏州人，在北京长大，北京话自然很地道，可是他说起苏州话来，“简直苏得了不

得！”我们马上提请她，她前一天还说这种说法是“胡说八道”，她顺口说“我也是胡说八道！”过了一天，我们去参观一座汉墓，对管理处负责人的介绍大为折服，一位同行者说，“他的介绍非常专业”。看来种这“胡说八道”也有一定的普遍性。

回来后，我查了一下书，丁声树等人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指出，汉语有体词谓语句，例如“今天国庆日。”汉语也有形容词谓语句，如：“酒味很纯正。”书中没有讨论“这个地方很郊区”这种用法，“郊区”明显是名词，而“很郊区”的副词“很”把“郊区”变成形容词，我们姑且把种这用法称为形容词化体词谓语句。这种用法不很符合汉语的习惯，姑不能被接受。但为什么又有人用呢？而用的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对自己的母语不是说都应具有 Chomsky 所说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吗？

为了了解人们对这种用法的态度，我们在广州外语学院做了一个小调查，参加调查的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教师，回收的问卷有51份。问卷共有15句话，个别句子是调查者有意杜撰（如“别进那个房间，那里风得很！”），以观察这种用法能否规则化，其他句子都是调查者亲自听到的。这些句子有两组：一组是丁声树书中所给的部分体词谓语句，另一组是作者听到的形容词化体词谓语句。另外有两句“这个人鬼得很”和“他对工会工作向来很热心”是故意安排的干扰项，“鬼”和“热心”，既是体词（如“胆小脑”和“您这份热心使我很感动。”），也是形容词（如“鬼头鬼脑”和“十分热心”），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形容词谓语句。我们在调查中把两类句子打乱排列，然后请被调查人在“接受”、“不

接受”、“无把握”三个框架中任选一个，如其中一句的结果是：

编号	接受	不接受	无把握
1	28	19	4

为了了解选择有无显著意义，需作卡方检验，但是选择“无把握”者甚少，它的期望值不能和其他两项相比，所以我们把它除以二，然后把得数加到“接受”和“不接受”中去，再计两项算其百分比及卡方检验的显著意义：

编号	接受	不接受	显著水平
1	30(0.588235)	21(0.411765)	0.207579

显著水平在0.05以下（即95%以上），“接受”和“不接受”的差别才有意义，对这一句话，我们只能接受无差别假设，即“接受”的频率虽略高，但只是微弱多数，考虑到其他的随机因素，我们不能根据这个统计数字就认为“今日国庆日”的说法完全可以接受。下面是全部句子的结果，体词谓语句和形容词化体词谓语句分开排列，凡显著水平在0.05以上者，我们在后面作标记“？””，即尚不能说“接受”和“不接受”的百分比有显著意义的差别。

一、从总的倾向来看，人们接受体词谓语句（0.89357），而不接受形容词化体词谓语句（0.7140），但程度上不同，接受形容词化体词谓语句（0.286）的人略多于1/4。所给的六个句子都有人接受，从0.11到0.5。13和14两句的“接受”和“不接受”不形成显著性差别。这说明这种用法已为部分人所接受，这个调查要求被调查人使用其语言知识来进行“监察”，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结构，而不在意义。因此在实际使用中，其接受程度估计还要大一些。

【表一】 体词谓语句用法的态度调查 N=51

编号	例 句	接 受	不 接 受	显著水平
1	今天国庆日。	0.588235	0.411765	0.207579?
2	他刚刚五十公斤。	0.823529	0.176471	3.82E-06
10	那个 人 黄 头发。	0.931373	0.068627	7.22E-10
15	这 张 桌 子 三 条腿。	0.95098	0.04902	1.18E-10
7	前 天 下 雨， 今 天 阴 天。	0.960784	0.039216	4.66E-11
6	钱 五！ 你 好 大 的 胆 子！	1	0	9.24E-13
8	三 斤 白 菜 一 块 钱。	1	0	9.24E-13
平 均		0.89357	0.10643	

二、语言的使用离不开语言规则，但又不仅是语言规则，还有一些别的制约因素在起作用，人的短时记忆是语言的中央处理器，它容量有限，而且瞬息即逝，所以口头交际都讲求效率，这就产生源于规则而又突破规则的策略性行为。好比下棋想速战速决，要下一些险着，这些险着带有冒险性，既可挟雷霆万钧之势攻克对手，也可能一败涂地。这是策略性行为的特点。使用“这个地方很郊区”这类用法的人

【表二】 形容词化体词谓语句用法的态度调查

N=51

编号	例 句	接 受	不接受	显著水平
13	这位向导的介绍非常专业。	0.5	0.5	1?
14	我们这个地方(指山区)很山。	0.431373	0.568627	0.326989?
5	老杨说起苏州话来简直苏得了不得!	0.264706	0.735294	0.000778
9	我的样子很中国。	0.215686	0.784314	4.89E-05
11	别进那个房子，那里风得很!	0.186275	0.813725	7.43E-06
4	外语学院这个地方很郊区。	0.117647	0.882353	4.73E-08
平 均		0.2860	0.7140	
3	这个人鬼得很。	0.980392	0.019608	6.82E-12
12	他对工会工作向来很热心。	0.980392	0.019608	6.82E-12

也许会意识到它不够规范，但出于交际需要，便“挺而走险”，因为它们往往简短而传神。怎样才能把这句话说得更符合汉语习惯呢？“这个地方是郊区。”——不好！没有把“很”的味道说出来。这个地方是郊区，离城里很远。”——也不好！因为“郊区”除了远以外，还有别的特点。

“这个地方很有郊区的特点。”——也不好！过于文皱皱的，不象口语。要找一个代替它的合适说法也不很容易，因此就临时制造一些估计听话人能够接受的说法，这些说法不能完全离开规则（如汉语有形容词谓语句），但又突破规则（把一个名词形容词化）。这些策略性行为十分灵活，不大能提高为规则，一旦成为规则，也会乱套，因为生成能力太强，既然“很郊区”可以，为什么不能说“太农村”？既然“很山”可以，为什么不能说“十分海”？但也不是毫无规律的，不然就不会有两位教授不约而同地使用同一说法的情况。在文革期间，人们流行穿军装，我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两个五、六岁的小孩说，“我要军色的帽子！”当时我觉得有趣。后来才听说部队里竟然有“军色”的说法，用以指解放服装专用的颜色。“那里风得很！”是作者杜撰的，居然还有19%的人认为可以接受。语言的策略性行为给语言的形式化处理带来很大的问题。如果不形成规则，计算机就不能处理这种现象，但一旦成为规则，就没有限制，连不能接受的也接受了。所以这种策略性行为的一个特点是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很专业”比“很中国”的接受程度高一些，是因为被调查人听到在这种说法多一些，没有其他的理由。我们在调查表中发现，被调查人并没有对这些句子作规则化处理，即认为形容词化体词谓语句一律都不能接受，而是逐句判断，语言使用中的策略性行为比比皆是，例如听人讲话，往往无须听完，就开始去理解讲话的内容和意图。理解自然会错，但万一理解对了，就提高效率，节省时间和精力。

三、我们在研究人工智能时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要使计算机运作，必须有算法，但是光依赖算法（规则）又不够。

80年代初期，我在美国到一家人作客，饭后大家一边玩 Scrabble（一种拼字游戏），一边聊天，很自然就谈到和电脑下国际象棋。我问那个喜欢下棋的小儿子，“和电脑下棋好不好玩？”他说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电脑反应很慢，人下一步棋，电脑得“想”一个通宵才能对付。当时的电脑运算速度较慢，而且只有规则，所以对付每一步棋，它要把己方每一个棋子应怎样走都算一遍，才能作出最佳选择。现在的电脑程序高明得多了，连象棋大师也能打败，因为它除了算法（规则）外，还体现了很多象棋大师经验的策略。策略和受规则支配的算法不同，算法的特点是只要它正确，最终都能取得正确的结果，但它的过程冗长而又烦琐，而策略的特点是它视情况不同而优先采用某些规则或路径，往往能缩短处理时间而又取得正确结果，但它不能保证一定取得正确的结果。就等于在公园里找出口，在十字路口处看见有多条小路，用算法原则处理，就每一条都试一试，终能找到大门。用策略原则则不同，要根据经验和观察（包括问路）选择自己认为最有可能的那一条。我们在语言处理中碰到歧义时，也会采用同样的办法，例如 Jones has bought the Times. 这句话其实是歧义的，一种理解是 Jones 买了一份泰晤士报，另一种理解是 Jones 收购了发行泰晤士报的出版社。一般人都会自然而然地选择第一条路径，因为买一份报纸比收购一间大出版社的概率要大得多。同理，在动物园看到的 shizi，是“狮子”，而不是“虱子”。所以策略的另一特点是，它是探索性（heuristic）的，也就是概率性的。在自然语言处理时，比较多的是使用以知识（规则）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的方法，进展不很大；最近又提出以语料库为基础的概率的方法，为世人所瞩目。例如在处理自然语

言时必须把一句话中每个词所属的词类标出来，使用规则的方法难度较大，英国语言学家 Leech, Sampson 和一些计算机科学家和数理统计学家根据英国英语语料库LOB 提出一个词类之间过渡概率的 133×133 的矩阵，用这个矩阵来标记词类，准确率达96%。在 John likes stews 这句话里，John 是专有名词，likes 和 stews 都可以是名词复数或动词第三人称单数，但是根据矩阵计算“专有名词+第三人称单数动词+名词复数”的概率为.69，而 likes 为名词复数的概率只有 .31，计算机在比较两个概率后，取其高者。Sampson 认为这种方法比人工智能的方法更为接近人类的语言处理。由此可见这种策略行为虽然灵活性很大，不能规则化，但也不是毫无规律可言的。计算机要根据语料库，而人则根据其使用语言的经验。

四、值得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虽然类似形容词化体词谓语句这种策略性行为在整体上还不能被接受，但是还会有人继续说，而且别人也能照样理解无误。这又如何解释？按传统的说法，人们可以说这些表达方式不够规范，说得严重一点，就是“胡说八道”，有意思的是认为它是“胡说八道”的人也会照样“胡说八道”。Sperber & Wilson (1986) 讨论到交际和认知时指出，交际模型有两种：一种是语码模型 (The Code Model)，另一种是推断模型 (The Inferential Model)。按照语码模型，交际就是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按照推断模型，交际是说话人为自己的交际意图提供证据，听话人根据证据来推断说话人的意图，两种模型互相补充，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只不过语码模型已为人熟知，而推断模型则是一些哲学家、语用学家、心理语言学最近20年来提出的。Sperber & Wilson 在这

两个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他们的关联 (Relevance) 原则，并把交际过程解释为“示意——推断交际” (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过程，说话人在示意，即通过各种手段使某些交际意图变得更为明显，而听话人则在推断，即理解其交际意图，要在交际中取得最大的认知效果，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最相关的信息，选择最合适环境，这就是认知环境。王教授那句话“说起苏州话来简直苏得了不得”在那样的认知环境下传递了最重要的信息，完成里示意——推断交际的过程，这简直是传神之作！哪能说是“胡说八道”？按照关联原则，人们虽然处于同样的外部环境，其认知环境也因人而异，因为人的感知能力、推断能力、信息提取能力，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心理表征都不相同。因此人们的语言态度就不会一样，故王宗炎教授说，“语言习惯是不完全统一的，有个灰色地带。”（个人通讯）Quirk等人在英国搞英语用法调查，首先把用法和态度区分开来，因为有的人用法和态度是一致的，但有的人是不一致的。而且态度本身也有不同：有的人相信自己的用法是对的；有的人自己不那么用，但却能容忍别人那么用；有的人把有些用法上升为规则。（Greenbaum & Quirk 1970）

五、这种使用语言的策略性行为很难纳入 Chomsky 的语言能力运用的模式。Sampson 引述 Russell 在《新政治家》的一篇讨论核战争的文章里所写的一句话 “Each side proceed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itself loves peace, but the other side consists of warmongers.” 从标准英语的规则来看，反身代词不能作子句的主语。但 Russell 在这里不是笔误，而是为了加强修辞效果，因为接着的是一句结构相同的平行句。Sampson

(1987) 认为按照 Chomsky 的说法，这句话只能算是语言运用中的偏离现象，但是如果语言能力比语言运用更为精细，它应该能够处理这些真实语言的。语言能力／语言运用的模式只能区分理想化的语言知识和它在运用时的一些心理和生理障碍，如说话前清清喉咙，话语的突然中止，说话中失言等等。但是把语言运用延伸到一些特殊的用法，这种两分法就无能为力。Sampson 还进一步认为，如果一个自动化的语言处理系统只能解决语言能力的问题，而不能解决语言运用的问题，这个系统总归是无用的。Chomsky 注意到人们可以凭自己的语言知识理解一些语法正确但全无意义的句子，如：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但是还有相反的情况：人们凭自己的语言知识也可以理解一些语法不完全正确但有意义的句子。两者都应该是语言能力。这种策略性行为和 Canale & Swain (1980) 所说的策略能力 (strategic competence) 也不相同，后者指的是语言与非语言交际策略，如怎样开始和结束一段会话，怎样转换话题，等等，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既受规则支配，但又按照不同的交际需要，灵活地使用规则，甚至突破规则，有所创造和发明，使自然语言呈现千姿万态。语言的这种创造性是语言固有的，也是人类最大的精神财富。

参 考 书 目

丁声树等 (1961)：《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中国语文杂志社

Garside, R., Leech, G., & Sampson, G. (1987) : *The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English: A Corpus-based Approach*. London: Longman

Sperber, D. & Wilson, W.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Greenbaum, S. Quirk, R. (1970): *Elicitation Experiments in English Linguistic Studies in Use and Attitude*. London: Longman

Canale, M. & Swain, M. (1980). Theoretical basi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 1, 1-47